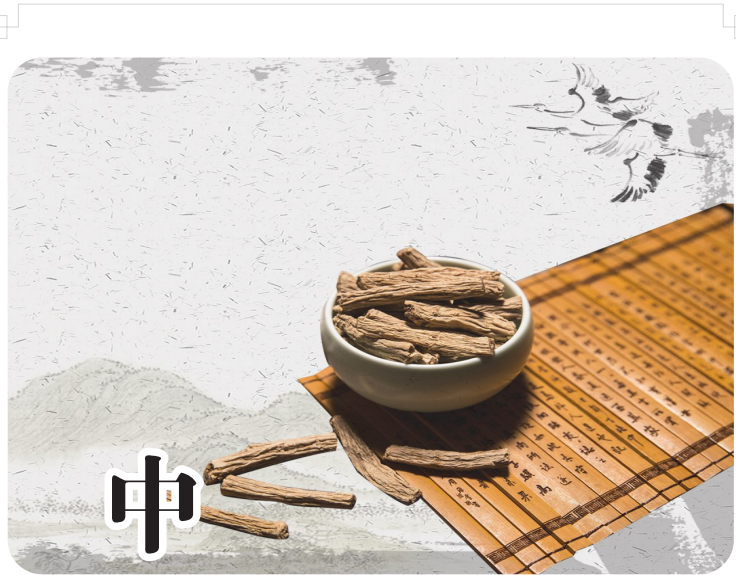




中华医道的『生生』仁德

□ 胡丹丹 任俊华

食用的谷部、菜部、果部，在动物方面，有虫部、鳞部、介部（甲壳类）、禽部、兽部等。《本草纲目》集本草学之大成，达尔文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本书的资料，并称其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英国李约瑟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明代万历年间，医书传到日本，先后被翻刻9次，后传到朝鲜和越南，并于18世纪传到欧洲，打开了西方各国医药界和博物学界的新视野。1953年苏联莫斯科大学校舍新落成，李时珍的肖像被镶嵌在大礼堂的走廊里，和李时珍并列的还有牛顿、哥白尼、居里夫人、达尔文等世界著名科学家。

“医者仁心”，中华医道将“仁”作为行医之德，妙术为体，仁心为用，推动儒学的仁爱精神在医学领域发扬光大。中华医道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仁”是儒学思想的核心主题，“仁”包含了对他人以及自然万物的关爱，“仁者爱人”。“仁”的本义是果仁，指果核里有生命力的部分，如杏仁、桃仁，儒学赋予“仁”以“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内涵，孟子还将“恻隐之心”作为“仁”的发端。中医汲取了儒学的仁爱精神，首先关注的是人，《千金要方序》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如果普遍爱护万类群生，而不关爱人类，就不是仁的本义了，《淮南子·主术训》说“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中医汲取了儒学的仁爱理念，医生以仁慈之心对待病人，实施救助，“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不畏艰难，倾力施救，正所谓“深心凄苍，勿避险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大医精诚，行仁心仁术，笃志于仁，重义轻利，心无旁骛，专心于患者之病，至于酬劳，则富贵人家不贪其钱财，贫穷人家不收其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而难者，医者还量力微赠。

中华医道的“生生”之仁，饱含着务实与创新的医学探索精神。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在历代诸家本草及中药理论的基础上，列举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雷公炮炙论》《唐本草》等四十一种本草著作，并加以简要评介。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辨别古书真伪，李时珍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各地寻觅草药、采集标本，比较药物性状特征之不同，记录于册。通过实证，对前人错误的记载一一加以纠正，对方士谬论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李时珍不畏艰险、重视调研、实地求证精神，后人以“远穷僻壤之产，险探仙麓之华”赞叹之。中华医者以“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的信念，求真务实、精于医道、开拓创新，向世界诠释着东方生命科学的大智大美。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古代的中医药源自大自然的生生馈赠。古代著名的药书中，因所记载的各类医药中以草类为多，故中药统称为“本草”，如《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本草纲目》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初本五十二卷，其中草部占比最大，有十卷，记载有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类、杂草等类。草药的性质按照五行分类，有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木部等。除此之外，还有百姓日常



党校思客讲堂 了不起的百年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碎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不断探索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之治”。

一百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49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了2019年，预期寿命是77岁。1949年，全国人均铁路长度不足5厘米，人均公路长度不到20厘米，还没有普通人一只脚长；2019年，中国的铁路、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雄踞世界第一。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什么中国能够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答案很明确：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中国之治的制胜法宝。

科学决策

决策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2020年，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抗疫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科学决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展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果敢的历史担当。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



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人物，被后世誉为“春秋第一相”“法家先驱”。管仲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少年时家道中落生活贫困，为了谋生，做过当时被视为身份微贱的商人，对经商有一些理解，并掌握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而后在任齐国丞相期间，管仲深耕经商治国之道，一展经国济世之才，使得国内百姓富足、国力渐盛，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被尊为一大名相。

以人为本，倡导“重民”“富民”。管仲常从民之安危的角度去探讨治国之道，认为治国经商之根本在“民”。在管仲辅佐桓公之前，前任国君齐襄公骄奢淫逸，穷兵黩武，四面树敌，从未把国家强盛、百姓安居放在首位，齐国一度陷入危局。管仲洞见症结，入主朝政后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主张。《管子·霸言》中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而富民的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商业。管仲所在的齐国邻近海岸，位置优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盐铁资源丰富，商人跨国经商，“服牛辚马，以周四方”，齐国的商业发展在当时已初具规模。管仲看到了商业发展对国力强盛的推动作用，提

中国之治的制胜法宝

□ 张 克

根本性问题，重视战略决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2020年春天，在抗疫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同时进行着一场事关民族复兴前途命运的战略谋划：“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正式启动。

“十四五”规划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孩童的学业、青年人的就业、中年人的事业、老年人的养老，这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起写入了“十四五”规划。

“五年规划”高瞻远瞩、大智兴邦。有人曾将“五年规划”编制过程总结为五大环节“屈群策”——“集众思”——“广纳言”——“合意决”——“告四方”，揭示了中国集思广益的科学决策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连续编制实施了十四四个“五年规划”，让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这充分说明：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跑一棒接一棒的接力赛。

高效执行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发现：科学决策领航中国，高效执行改变中国。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个独特的制度优势，那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强大执行力克服艰难险阻，完成各种艰巨任务。

用8年的时间，让近1亿人摆脱贫困，中国做到了！

在中国，扶贫不是某一个政府部门的职责，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所有国家机构都需要承担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一场大决战。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数量难以统计，仅在一线专职从事扶贫的第一书记、帮扶干部就有300多万人。

在抗疫斗争中，从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到部署方舱医院，从援鄂医疗队集结出征到武汉10天完成1000万人全员核酸检测，不断刷新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令世界惊叹。

为什么中国能够高效执行？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类国家治理主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



又有效进行集中，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问题，避免了效率低下的弊端。

改革创新

如果把中国想象成一列飞驰的高铁，科学决策是高铁的“卫星导航系统”，高效执行是高铁的“网络控制系统”，改革创新则是高铁的“动力推进系统”。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洋教条”、打破了“土教条”，依靠改革创新，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1980年，党和国家批准设立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40多年来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发挥了制度创新“试验田”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2020年，“跟党一起创业”主题标语遍布深圳的大街小巷。“跟党一起创业”——这是深圳市探索党建引领企业

创新创业提出的新理念。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励志的创业故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改革创新，带领人民创造彪炳史册的不朽业绩？其实答案就藏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党章》总纲部分写道：全党必须“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自带改革创新的强大基因。

百年奋进，薪火相传。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决策、高效执行、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

踏上新征程，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一百年来宝贵经验，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为人类制度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下一讲主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主讲人：李海青

管仲的经商治国之道

□ 邢 畅

出“有市，无市则民乏矣”，“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强调兴办市场、鼓励就业更有助于促进城乡繁荣，不至于使民“乏”。管仲积极引导民间商业的发展，鼓励百姓入海捕鱼，即使是在盐铁业中也未完全禁断民间商贾的介入。在管仲看来，无论是治国还是经商，其根本都在于民，“重民”“富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以义为先，提倡取舍有道。管仲提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可见，管仲既否认认人的好利之心，也不否定高尚德行的存在，认为“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对于不同的人，在义利方面就要有不同的要求。对于君主来说，不能使国力兴盛、民众受益，就不能称得上具备君主之“义”。《管子·国蓄》中曰：“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对于商贾来说，商业利益是其生存发展之必需，“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商贾的活动能够为社会增添财富，这便是商人之“义”。管仲甚至还说服齐桓公把齐国分为士乡和工商乡，优待工商，不服兵役，保证其专精一域，把经商和制造手工业品变为专业。而对于百姓来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在粮仓充足、丰衣足食的前提下，依乎伦理道德行事，这是百姓之“义”。可见，在管仲看来，不论是君主，还是商人和百姓，只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取舍有道，以义为先，就能在自身获利之时坚守仁义之心。

平衡贫富，主张“和合故能谐”。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社会财

富主要集中在食封贵族和富商手中，管仲敏锐地觉察到“贫富无度则失”，认为贫富无度必定影响国之安定，并将“有贫贱者”列为国家三大忧患之一。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忠，士不尽死矣。”管仲敏锐地意识到，如若财富都被大商人攫取占有，那么，官吏就不会为国家尽忠，将士就不会舍命报效国家，因此，他主张“和合故能谐”。管仲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现状，首次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即“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要求“四民”各安其位，忠于职守，各尽所能，专精其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百姓四处流亡，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管仲主张采用“轻重之术”平衡社会财富关系，《管子·揆度》中曰：“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管仲在齐国一方面推行“相地而衰征”，制定薄税敛等规章制度减轻民众租税负担，避免占地土质较差的农民承担更重的赋额，另一方面限制过分追逐商业利益，避免因忽视农业而动摇国之根本。可见，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下，管仲非常超前地看到了“贫富无度”之积弊，认识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主张君子要“能散积聚，钧养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富上足下，贫富有度，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诚信为纲，推崇诚信之德。管仲将“诚”与“信”二字合用，提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并将诚信思想在齐国大力推行。“诚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并蔚为大观，即是发端于此。《管子·乘马》中曰：“非

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管仲认为，不论是经商、做工，还是务农、为官，诚信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选官任官方面，管仲任人唯贤，推行三选用人制，保证优秀人才可以得到重用，并提出“贤者诚信以仁之”，“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将做官为政是否取信于民作为选官任官的重要判断标准，强调“功成而不信者，殆”。另外，管仲深谙奖励之道，劝告齐桓公尊重人才，即使对于当时身份微贱的商贾，也要用物质奖励来回馈其诚实守信的行为。《管子·揆度》中曰“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便是强调诚信仁义之士必须得到一定的奖励，“中情诚信，则名誉美矣”，以此逐步引导商贾自觉履行诚信之德。

管仲其人，始终抱有兴国安邦之志，他辅佐齐桓公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实现了国家兴盛，百姓安居。孔子曾感慨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明代赵用贤称赞说：“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梁启超则称管仲为“最大政治家”。管仲的经商治国之道可谓影响深远，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